

# 清末民初共时意识下的“近世”书写<sup>\*</sup>

朱文哲

**【摘要】**清末民初之际,移植自西方的“近世”概念及分期方式,被时人赋予了中西交通文明开化、中西竞争民族争胜的历史内涵,又蕴含着人们对最近历史阶段的认识及未来历史发展的预设。不过,在全球共时意识催生出的中国“近世”书写中,清末所形成的“近世”分期时间框架及内涵,在民国初年反倒成为人们对最近历史阶段认识的限制,对这一历史分期进行重构便成为必然选择。“近世”历史分期的蜕变,呈现了全球时间革新对时人“最近之历史阶段”认识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 历史分期 近世 近代

**【作者简介】**朱文哲,历史学博士,南方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21)05-0135-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时间革新运动经由历法统一和标准时间扩展,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sup>①</sup>特别是由时区划分所构建的标准时间,以及电话电报等通信方式对时间的传播,使得全球时间进入“共时”阶段。与西方处于共同“时刻”且未来发展以西方为目标的共时意识,使得清末民初时人对历史发展的图景进行了根本性重构。在此过程中,清末民初时人对西方现代线性时间体系的了解和接受,促使了现代线性时间观念在中国的逐步确立,并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以西方历史为背景且以西方历史演化阶段为标准的“普遍历史”中。而“‘普遍历史’及划分历史时代的观念,是西方史学思想中极富特色的内容,也构成了中西历史‘合和’最基本的环节”。<sup>②</sup>其中,“近世”的历史分期,用以指称“最近之历史”,又作为“将来史之楔子”,<sup>③</sup>受到时人的高度关注。

“近世”概念在清末民初历史书写中的确立,不仅是史学观念革新的促动,也是历史时间指向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官定历书研究”(15CZS038)的阶段性成果。

① 瓦妮莎·奥格尔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标准时间助力了全球化,所以“它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呈现了自身”,“并非偶然的是,进化谱系、技术网络,以及‘现代的’和‘古老的’时间,都强烈地标识出并构成了种族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经济的等级制和权力关系。以不同形式表现的时间在本质上是一种话语的、制度性的和技术性的衡量尺度,它生产了一种全球意识并允许其出现”。从这个意义上看,清末民初历史分期的变化也是时间全球化的结果。参见[美]瓦妮莎·奥格尔:《时间的全球史》,郭科、章柳怡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48页。

② 章清:《“普遍历史”与中国历史之书写》,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

③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页。

化的结果。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使得中国传统时间观念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单向线性时间观念确立,统摄古今中西的历史时间框架得以形成。在这一时间框架内,“近世”的历史时段蕴含着“西学东渐”使中国“文明开化”之意,展现了时人对与“现在”有着极为密切关系的历史阶段之认识,但这一带有西方历史背景的时段划分,又与中国历史演化进程的实际多有出入,促发了时人对“近世”意涵的不断重构。<sup>①</sup> 以往对“近世”历史分期的来源、意涵及影响都有一些研究,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侧重从历史时间分割及历史书写需求的角度探析“近世”历史分期的蜕变,具体回答“近世”的时间概念作为时人全球共时意识的结果,在历史书写中是如何被呈现,又如何对时人的书写造成制约,以及他们对这一“异质”的历史时间进行了何种反思和重构。

## 一、“断代”与“断世”:历史分期观念的变化

历史分期作为历史书写者“制作”时间的结果,是认识与研究历史的重要工具。法国史学家安托万·普罗斯特(Antoine Prost)认为:“分期让人能同时思考延续和断裂,它首先把延续和断裂划给不同的时刻:在各时期内部是延续,在各时期之间是断裂。时期一个接着一个,一个与一个不同;进行分期,也就是确定断裂之处,对于改变的内容亮明态度,定下改变发生的日期,并对其进行初步确定。而在一个时期内部,同质性占上风。”<sup>②</sup> 不过,确定异质性的历史事件以划分历史分期却并非易事,因为影响书写者历史分期的因素,除了历史演化本身的特点之外,还有书写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以及书写者个人对历史的总体认知,尤其是历史分期作为“历史学家的意识形态观来重新建构”的历史时间,其表现形式“并不与属于实在的那些时间严格对应”。历史学家选择其中的某一些,排除另外一些,从而表现出“时间的持续性”。<sup>③</sup> 由此观之,解析某一时期的历史分期及其表现形式,有助于理解历史书写者对历史时间的构造及其多重因素,以及历史时间架构对历史书写的影响。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历法时间的重大变革是构建了贯通古今、联通中外的线性时间体系。在经过清末的纪年论争之后,用一以贯之的符号来纪年,已成为时人的共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趋新人士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之下,以西方时间体系为参照标准的民国纪元使用范围日渐扩展。在此情况下,均匀的、统一的、连续的、不可逆转的历法时间,成为规训“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各方面的标准,与传统历法时间体系凸显的“循环”特性已不可同日而语。历法时间的变革,也成为历史时间重构的思想资源。<sup>④</sup> 1919年,钱玄同将“基督纪年”改称“公历纪年”,并倡言“中国当用世界公历纪年”。在他看来,使用“公历纪年”,“于考古、于现代应用,都是极便利的”。<sup>⑤</sup> 1929年,时任

① 现有研究成果对“近世”历史分期观念与日本的关联、“近世”与“近代”的区别联系,以及“近世”历史分期下的历史书写都有探讨。参见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4~64页;[日]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译,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81~98页;刘超:《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第132~141页;尚小明:《由“分期”史到“断代”史——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之演变》,《史学集刊》2011年第1期,第56~68页;向鸿波:《历史分期观念与“中国近世史”的生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1~90页;宣朝庆、陈旭华:《从社会时间到社会形态:“近世”概念中的学术共同体意识》,《河北学刊》2016年第2期,第160~167页;等等。不过,从全球时间革新的角度解析近代中国“近世”历史分期内涵的蜕变及其在历史书写中的呈现,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②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页。

③ [法]乔治·古尔维奇:《社会时间的频谱》,朱红文、高宁、范璐璐译,金梦兰、朱红文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

④ 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历史时间的重构》,《史学理论研究》2016年第4期,第67~79页。

⑤ 钱玄同:《论世界当用公历纪年》,《新青年》第6卷第6号,1919年11月1日,第630页。

教育部部长的蒋梦麟颁行《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规定历史课程的纪年采用“公共纪元”：“中国历代君主纪元纷更，历史上的纪元标准遂成一大问题。为求年代的的确与中外史迹的联络起见，采用西历纪元为公共纪元，实是比较便利的办法。（有人主张用黄帝纪元或孔子纪元，皆不甚通行，而由民国纪元倒推，更属混淆）。教者于中国史上的大事，可采用西历纪元为标准，同时仍附说中国帝王的年期，使学生易知一事经过的时间，与其离今的年数。”<sup>①</sup>从中可以看出，以西方时间体系为主线的线性时间已成为当时国人认识历史和书写历史的基本常识。

在历法时间体系业已重构的情况下，历史时间也亟待被重新构建。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指出“区分时代”之必要：“叙述数千年之陈迹，汗漫邈散，而无一纲领以贯之，此著者、读者之所苦也，故时代之区分起焉。中国二十四史，以一朝为一史，即如《通鉴》，号称通史，然其区分时代，以周纪、秦纪、汉纪等名，是由中国前辈之脑识，只见有君主，不见有国民也。西人之著世界史，常分为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等名。”<sup>②</sup>在他看来，以朝代作为历史阶段的划分，其中包含了极为强烈的“君主”色彩，且呈现出片断性的缺陷，无法贯通历史，尽管西人的历史分期之法也有对历史的“武断”区分，但借用西人以“时代”划分历史可以摆脱“专制”的影响，历史连贯无断，又为因果关系的探求提供了条件，为治史提供了便利。此种看法几乎成为清末倡导新史学之人的共识。曾鲲化说：“中国历史旧例，只区朝代而无时代之分，此蔽读史者之智识，塞读史者之感情之大端也。”<sup>③</sup>许之衡也对“断代”作史不以为然，他认为“断代一例，尤为史家之大惑。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故今后之作史，必不当断代，而不嫌断世（如上古、中古、近古之类），藉以考民族变迁之迹焉”。<sup>④</sup>相较而言，刘师培则更关注中国历史分期与西方历史分期的相近之处，肯定西方史学区分时代的优点，他在1905年编纂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指出：“西国史书多区分时代，而所作文明史复多分析事类。盖区分时代，近于中史编年体，而分析事类，则近于中国三通体也。今所编各课咸以时代区分先后，即偶涉制度、文物于分类之中，隐寓分时之意，庶观者易于了然。”<sup>⑤</sup>

综上所述，不管是梁启超、曾鲲化、许之衡对“朝代”的批判和对“时代”的赞扬，还是刘师培对西洋史书“分时”的肯定，都表明他们对西洋史分期取向的认可。清末很多著作借鉴西方历史分期，也显示出西方历史时间体系及其附加的价值观念已对中国历史书写产生影响。这一变化还导致中国古典的时代概念意涵发生转变，并与西方历史分期的概念相接近。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专著如二十四史中也有‘上古’、‘中古’、‘近古’/‘近代’/‘近世’的时间分期，然而，基本上不是以前后相续的系列分期的形式，而是以分开的、零散的形式出现的，故二十四史中的时间分期法是不系统的。同时，各分期之间也没有确切的时间断限，分期也因而失之笼统。”古代文献中的“近世”更多带有朝代的意涵，但在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褪去了朝代底色”。<sup>⑥</sup>此种变化不仅是时人反对专制之“朝史”的结果，更是由于西方线性时间引入并在中国的时间体系中确立其主导地位所导致的。历史分期附着于连续不断且不可逆转的现代线性时间体系上，原有的各个历史分期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也都因此必须重构。

① 《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湖南教育》第13期，1929年11月30日，第20页。

②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册，第11页。

③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上册，东新译社1903年版，第3页。

④ 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卷第6期，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六月二十日，“社说”，第5页。

⑤ 刘师培：《中学历史教科书》，《刘师培全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影印版，第275页。

⑥ 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9页。

在历史时间观念革新的情况下，“近世”历史阶段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对于试图将中国历史纳入“普遍历史”书写之中的时人来讲，“近世史”作为中西历史接榫的关键，既涉及对与“现在”关系最密切之历史的认识，也影响着人们对“未来历史”发展的预设。朱希祖在1922年为谢风标所著《中国近世史》撰写的序言中写道：“言史学者，以近世史为最要，良以当今之社会与近世之历史，至有密切之关系，因果相连，不能宰割，故不读近世史，则涉世如盲瞽，其危殆可立见也。”<sup>①</sup>郑鹤声也认为“近世史”“实有特殊之征象，不可与上古、中古相提并论者”，一是“关于人类生活之最密切”，二是“关于国际变化之繁颐”。<sup>②</sup>在历史教学中，“近世史”的地位也日渐凸显。1914年，有人主张小学历史教授“宜重近世史”。<sup>③</sup>1922年，中华教育会历史教学组主张，在课程时间的安排上，“上古、中古、近古史占二分之一，近世、现代史占二分之一”。<sup>④</sup>两年后，历史教学组甚至提案建议“小学历史宜专授近世史”。<sup>⑤</sup>从这些述论可以看出，民初学人在线性历史时间的分割中，将“近世”界定为“西力东渐”且与今日关系最为密切的历史阶段，并在历史书写和历史教学中给予了高度重视。

## 二、更化之期：“近世”分期的意涵

清末时人对“近世”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借鉴了日本学者的分期框架。<sup>⑥</sup>其中尤以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和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影响较为广泛，促使中国历史教科书的编订从“朝代体”向“时代体”变化，也推动了“近世”等历史分期概念的传播。<sup>⑦</sup>1899年，桑原鹭藏的《东洋史要》被译介入中国，该书以“支那本部之大势为中枢，参考其余诸国之兴亡、各族之盛衰”，将东洋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上古为汉族增势时代、中古为汉族盛势时代、近古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近世为欧人东渐时代。<sup>⑧</sup>“近世”的历史阶段是从“大清初叶”开始，止于日本吞并琉球。陈懋治编写于1904年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其“近世史”的开端就是“大清之统一”。不过此书较为独特之处在于除了“近世史”部分，还编有“近世前纪”和“近世今纪”部分，前者叙述了“满洲之兴起及莫卧儿帝国”和“欧人之东侵及耶稣教之传入”，后者则以甲午战争起笔。<sup>⑨</sup>1905年，夏曾佑在《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将清王朝的历史称为“更化之期”，未明确用“近世”概念，但从他的定义中仍能看到“近世”的影响：“此期前半期，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sup>⑩</sup>1909年，汪荣宝编纂《中国历史

① 朱希祖：《中国近世史要略序》，《史地丛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第1页。

② 郑鹤声：《中国近世史》，中央政治学校1944年版，“自序”，第1~3页。

③ 希甫：《历史教授法之研究》，《中华教育界》第18号，1914年6月，第6页。

④ 《第十一历史教学组》，《新教育》第5卷第3期，1922年10月，第503页。

⑤ 《第十九历史教学组》，《新教育》第9卷第3期，1924年10月，第593页。

⑥ 有论者强调了清末从日本传入的历史分期观念“在欧洲与中国间居于折中调和地位”，尽管在书写中以中国为东亚史的主体，但着眼点在日本而非中国。参见向鸿波：《历史分期观念与“中国近世史”的生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84页。不过日本的此种历史分期是以西方历史分期重构东亚史的结果，因此仍是西方历史分期的一个构成部分，也是将东亚史纳入“普遍历史”的一种尝试。

⑦ 相关研究可参见李孝迁：《清季支那史、东洋史教科书介译初探》，《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第101~110页；何成刚：《从译介、改编到自编：民国历史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5期，第95~99页；毕苑：《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0—1915）》，《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92~105页。

⑧ [日]桑原鹭藏：《东洋史要》，樊炳清译，东文学社1899年版，第4~5页。

⑨ 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7年版，第74、88页。

⑩ 夏曾佑：《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5年版，第7页。

教科书》，也参考了桑原鹭藏的分期，将“近世史”界定为“本朝创业以来”的历史。<sup>①</sup>这部由清廷学部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集中地反映了时人“近世史”即“本朝史”的观念。沈颐在《中国历史讲义》中对“近世”的划分更为细致：“就吾国五千年之历史言之，则近世期为吾国更化时代，就二百数十年之近世史言之，则又可分为四期：其一，开创时期，自本朝创业之始，迄于三藩之平定；其二，全盛时期，自康熙中世，迄于乾隆末年；其三，忧患时期，自嘉庆初年，迄于庚辛间之拳祸；其四，变更期，自庚辛以后迄于今日。”<sup>②</sup>尽管他使用了“近世”的历史分期，但历史叙述仍然是以“清朝史”的框架展开的，因而对重大历史事件以“顺治朝”“康熙朝”“雍正朝”作为时段界定。综上所述，这些历史分期虽注意到了“近世”是“西力东渐”的结果，但将“近世史”基本等同于“本朝史”，尚未摆脱“朝代”的痕迹。

另一方面，晚清之际由内忧外患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也成为影响时人历史分期的重要因素。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将“中国近世史”界定为“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又君主专制政体渐就湮灭，而数千年未经发达之国民立宪政体，将嬗代兴起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sup>③</sup>日本学者岸本美绪也注意到了梁启超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借鉴了桑原鹭藏等人的观点，但亦十分注重从中国内部寻求历史分期的缘由。<sup>④</sup>1903年，曾鲲化在所著的《中国历史》中说道：“中国无历史学。所谓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书，皆数千年王家年谱、军人战记，非我国民全部历代竞争之国史也。今欲振发国民精神，则必先破坏有史以来之万种腐败范围，别树光华雄美之新历史旗帜，以为我国民族主义之先锋。”<sup>⑤</sup>这种以鼓荡民族主义为目的的历史书写，以汉族的发生、嬗变为标准，将中国历史分为七个时期：太古纪，汉族发生时代；上古纪，汉族创国时代；中古纪，上期为汉族优胜时代，中期为汉族与外族势力平均时代，末期为汉族全盛及外族复炽时代；近古纪，汉族与外族冲突时代；近世纪，外族极盛及东西两洋交涉时代；前世纪，汉族复盛及西力东渐时代；现世纪，汉族衰败及极东多事时代。<sup>⑥</sup>在这种历史时间架构中，历史评价的标准也不再是正统的史学观，而完全代之以民族主义，尽管仍有桑原鹭藏的历史分期注重种族兴替变迁之遗痕，但新的历史分期跳脱了“朝代史”框架，促使书写者转向以自身历史为主要参照的“时代史”模式。

民国代清而立，以“五族共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成为“近世”的主要内容，这就需要时人构建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时间框架。1918年，傅斯年发表《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一文，首先对《东洋史要》的历史分期予以批判：“桑原氏书，虽以中华为主体，而远东诸民族，自日本外，无不系之。既不限于一国，则分期之谊，宜统合殊族以为断，不容专就一国历史之升降，分别年世，强执他族以就之。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紧接着，他又对国内史学研究套用西洋与日本的历史分期之法提出批评，指出历史分期要“执一事为标准”。<sup>⑦</sup>傅斯年所说的“执一事为标准”，具体是指“汉族之变化升降”，以此统括从古至今的历史变化。柳诒徵则认为以“五族共和”为“标准”述论历史：“藉令

① 汪荣宝：《中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0年版，第1页。

② 沈颐：《中国历史讲义》，《师范讲义》第10期，宣统三年（1911年）二月二十日，第231页。

③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册，第11页。

④ [日]岸本美绪：《中国史研究中的“近世”概念》，黄东兰译，黄东兰主编：《新史学》第4卷，第81~98页。

⑤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上册，第1页。

⑥ 横阳翼天氏（曾鲲化）：《中国历史》上册，第4页。

⑦ 傅斯年：《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北京大学日刊》第113期，1918年4月17日，第4版。

今兹别纂国史，较之前代实难尽符。前史根于帝王，故可专述一姓受命之基础，今史标举民主，则当历溯五族共和之渊源。凡兹满蒙回藏之分布域中，岂自辛亥八月，而骤成气类，与其踵述往事，毋宁径接通史第，当区分时代，详于近世。后有万年，来者靡既，凡上世之轶闻，皆后事之张本耳。”<sup>①</sup>同年，顾颉刚编写《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五个阶段：秦以前为“上古”，从秦初到五代之末为“中古”，从宋初到明末为“近古”，清朝时期为“近世”，中华民国时期为“现代”。这种划分与当时其他学者并无多大的差异，不过顾颉刚赋予每个时期的特点则有独到之处：上古为“域内文明的成人时代”，中古为“中国民族文化的蜕变时代”，近古为“中国民族的争存时代”，近世为“东西文明的接近时代”，现代则为“中国文明的世界化时代”。<sup>②</sup>这一取向虽未摆脱以往历史分期框架的限制，但顾颉刚试图以“中国民族”及“中国文明”为书写主体，赋予了历史分期以新的意涵。

进而言之，清末民初时人的“近世”书写中，“近世”用以指中西交通的历史时期，这就意味着“近世”蕴含着中国须经过西方曾经经历过的阶段之指向。这一化约带来的结果就是假定了西方历史具有“普适性”，甚至是中国历史必须经过的阶段，以西方历史分期为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1913年，赵玉森在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时，将中国史分期与“东西洋史分期互相参校，冀归一律”，在他看来，此法“俾免学生将来讲授东西史时，因分划之过差而生误会，引起教授上之困难”。<sup>③</sup>这一取向在历史分期上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便是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的《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采用混合教授之法：“中学历史，向分本国史、世界史二部。今为使学生们明了世界人类生活共同演进状况，打破关于朝代国界的狭隘观念起见，初中历史编制宜取混合主义，以全世界为纲，而于中国部分，特加详述，使学生对于本国历史得因比较而益审其在世界史中之地位，似较分授之制为善。”<sup>④</sup>中国史完全被整合进世界史的时间框架之内，以世界史演化为标准所形成的“历史分期”，成为中国史外在的框架。尽管该课程标准仍按照“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代”展开叙事，不过中西混合教授带来了诸多不便，随后力主推行该法的常乃德又按照“文化的发生、东西两大帝国、三大宗教之传布、黑暗时代之前后、新生时代、民权思想之兴起、民族帝国主义”，将整个历史划分成七个阶段，“近世”所对应的是“新生时代”。<sup>⑤</sup>但这种做法带来的弊端极为突出，时人就批评说：“中西民族，在十六世纪以前本为各别发展，其史迹关联甚少。混合编制与教授，终莫能寻绎其共通的线索。即在近世，虽多共通之事，仍复自为系统，若必牵强附合，杂然并举，势必强为迁就，徒失其真。”<sup>⑥</sup>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种将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史的努力，实际上是将中国史变成了西方“普遍史”的附属和注脚，外在时间框架的限制必然会压抑时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和书写，因为在这一框架中只有与西方关联的历史才是值得书写的。

综合来看，清末民初之时“近世”受到时人高度关注，既与时人需要了解“最近之历史”有关，也与人们需要认识中国未来之趋向有关。首先，“近世”是中西历史交融的关键时期，由西方所带来的“现代性”成为这一时期最鲜明的特征，所以时人多以“更化之期”将“近世”与中国之前的历史加以区分。其次，在由古至今的线性时间序列中，历史演变呈现出“进化”特征，而“近世”又

① 柳翼谋：《清史刍议》，《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第33页。

② 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全集》第11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3~15页。

③ 赵玉森编纂，傅运森、蒋维乔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13年版，“编辑大意”，第2页。

④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河南教育公报》第2卷第15~17期（合刊），1923年8月，第7页。

⑤ 常乃德：《新制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编制之一得：为解释并补正课程标准而作》，《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1期，1924年7月，第1~9页。

⑥ 陈训慈：《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史学杂志》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第1页。

位于线性时间体系的最近端，“趋新”的意义十分明显。最后，“近世”还蕴含着中国历史的未来趋向，作为与西方“共进文明”的历史阶段，“与世界大同”的指向极为清晰。清末民初“近世”历史阶段的划分，是时人构建中国“现代性”的结果，但又是将具有西方历史文化底色的时间体系移植的副产品，也导致了时人将中国历史纳入到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普遍历史”中。

民初由政府颁定的《历史课程标准》和各类历史教科书，则将“近世”的历史分期推广到更大范围，产生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1913年北京政府公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将中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和现代”五个部分，用两个学年进行讲授，其中第一学年讲授本国史之上古、中古、近古部分，第二学年讲授本国史之近世、现代部分。<sup>①</sup> 1923年，北京政府颁布《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按照“上古、中古、近古和近世”的统一分期囊括了中西历史的内容，其中中国近世史是从“近百年来欧洲大事”起笔，下限则是“欧战后世界之大势”。<sup>②</sup>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高级中学普通科本国史暂行课程标准》，均采用了上古、中古、近世和现代的历史分期，“近世”历史阶段限定为16世纪至20世纪初，仍以“东西新航路的发现与欧人的东来”起笔，并强调此法“大抵打破以朝代分界的旧观念，而取一种转移大局的潮流做标准”。<sup>③</sup> 这类历史分期既是当时学术界普遍认识的反映，又通过课程标准颁行影响了更多人的历史分期观念。

### 三、“难执一事为标准”：“近世”时间指向的困境

以西方历史分期分割中国历史进程无异于削足适履，自然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历史分期的思考。清末时人就已经认识到以外人之标准述论中国历史的危害：“近岁以来，各学堂多借东邦编述之本，若《支那通史》，若《东洋史要》，以充本国历史科之数。夫以彼人之口吻，述吾国之历史，于彼我之间，抑扬不免失当。吾率取其书用之，勿论程级之不审，而客观认作主位，令吾国民遂不兴其历史之观念，忘其祖国所自来，可惧孰甚。”<sup>④</sup> 在傅斯年提出历史分期要“执一事为标准”之后，梁启超也在1922年对自己20年前所提倡的分期主张进行了反思：“历史本为整个的。强分时代——如西洋旧史之分上古、中世、近世等，已属无理。若如中国旧史以一姓兴亡断代为书，则无理更甚。”<sup>⑤</sup> 这些反思对于破除中国历史分期完全依附于西方多有助益，为构建适合于中国历史的时间框架提供了思想资源。

不过，由分期所形成的时间框架对后来者也造成了制约，“历史学家不是在每次研究时都整个重构时间：他接受已经由其他历史学家加工过的、分好期的时间。因为历史学家所提问题在科学上的正当性取决于其在这个场域中所处的位置，所以他不能无视此前的分期；这些分期已是职业语言本身的一部分”。<sup>⑥</sup> 清末时人将“近世”界定为“本朝史”，但进入民国后，随着民国史范围的日渐拉长，“近世史”为清朝史的历史分期无法涵盖民初历史，更无法凸显革命党人革命的历史影响，如何书写这一“当代史”就成为时人的急迫需求。与此同时，清末时人关于“近世史”的时间框架、内容意涵及语言使用习惯，都对民初的历史书写造成了限制。在此情况下，构建区别于“近世”固有时间框架和使用习惯的历史分期，便成为时人的选择。

① 《教育部部令第十六号：中学校课程标准》，《政府公报》第315号，1913年3月23日，第8页。

② 《初级中学历史课程纲要》，《河南教育公报》第2卷第15~17期（合刊），1923年8月，第8页。

③ 《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河南教育》第2卷第16期，1930年3月31日，第15~16页。

④ 丁保书：《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文明书局1906年版，“编辑大意”，第1页。

⑤ 梁启超：《中学国史教本改造案并目录》，《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1922年11月，第5~11页。

⑥ [法]安托万·普罗斯特：《历史学十二讲》，王春华译，第103页。

首先，“现代”“最近世”等新分期概念出现。“近世”分期作为移植而来的时间概念，本来是清末时人欲借之以凸显“西力东渐”所带来的新气象，但该段历史与清朝史重合，“近世”应具有的内涵因此无法被有效表达，这一内在矛盾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更加凸显。如果将“近世”阶段以明末清初之际的中西交通为始，止于清王朝灭亡，那么该历史时段便更多具有中国“专制王朝”的特性，难以突出“西力东渐”影响下“近世”的“现代性”，因此在“近世”之外重构或新划历史分期就极有必要。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都在“近世”之后划分出“现代”历史阶段，“现代史”成为历史教科书的重要部分。赵玉森编纂的《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就已经有了“现代史”分期，包括“中华民国之肇兴”“南京临时政府”“北京临时政府”“现代之文化”四章内容。<sup>①</sup> 1922年，吕思勉编撰《白话本国史》，将历史划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最近世史”，“近世史”的时段是从元至清中叶，“最近世”则为“西力东渐至现在”。<sup>②</sup> 1925年，孟世杰将中国“最近世史”界定为“鸦片战争至民国成立”，依据就是“鸦片一役，开对外战争之端，创门户开放之局，藩篱尽撤，外力交侵，实为近百年忧患之种源”。<sup>③</sup> “现代”和“最近世”都隐含了中西交往更密切、中国社会蜕变更趋“新异”的内涵。特别是“现代”，作为更能展现“新异性”的时间概念，摆脱了“近世”以明末清初作为分期所具有的“传统性”。<sup>④</sup>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书写者的历史叙事为了凸显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以“现代”统摄其革命历史，自然是原来“近世”难以达到的效果。至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明确将“现代史”界定为“自清季即约一九〇五年至最近”。<sup>⑤</sup> 换句话说，“近世”作为西方历史时间架构直接移植的结果，在套用到中国历史进程中也逐步呈现出“固化”的特点，使得人们在认识晚清时期更具异质性的特点时显得捉襟见肘。

其次，“近代”历史分期使用日渐广泛。“近世”历史阶段划分多以明末清初为起点，突出的是中西交通，但随着近代中国革命反对外来侵略的急切需求，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凸显其“革命”意涵又正当其时。<sup>⑥</sup> 有论者就指出：“将中国近代史开端定于清初的‘西力东渐’，可以与西方历史发展同步，但这个起点显示的是‘世界’的中国近代史，而非‘中国’的中国近代史，无法体现中国历史的特色；更重要的是，以‘西力东渐’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无法为当下反帝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提供正当性。”<sup>⑦</sup> 在这一背景之下，以“近代”与“近世”相区分，也成为时人重构“近世”意涵的取向之一。1929年，汪懋祖在为陈其可《中国近世史》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就说：“中国近世史乃一部国耻史兼革命史也。”<sup>⑧</sup> 在这一视角的观照之下，陈氏之书“以专制之推翻为经，以列强之压迫为纬，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展开书写。<sup>⑨</sup> 1930年，李鼎声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也说：“我们在这里

① 赵玉森编纂，傅运森、蒋维乔校订：《共和国教科书·本国史》上册，“编辑大意”，第1页。

② 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③ 孟世杰：《中国最近世史叙论》，《南开周刊》第1卷第1期，1925年9月，第12~13页。

④ 章可：《超越历史分期概念：汉语“现代”概念的创出》，《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第95页。

⑤ 《初级中学历史暂行课程标准》，《河南教育》第2卷第16期，1930年3月31日，第14页。

⑥ 王先明在论述近代中国革命史形成时指出，中国革命史的兴起或形成，不是“新史学”时代诉求的直接产物，而是新时代革命运动主体历史的产物，甚至在中共“革命史”话语体系里，也仍然承继着中国革命史的一般学理统系，即对中国革命史的开端、分期和反帝反封建的时代属性的认同，都是相对一致的。参见王先明：《关于革命史的形成、建构与转向的历史思考——兼论“新革命史”问题》，《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6期，第123~134页。

⑦ 刘超：《古代与近代的表述：中国历史分期研究——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人文杂志》2009年第4期，第140页。

⑧ 汪懋祖：《〈中国近世史〉序》，陈其可：《中国近世史》上册，小说林书社1929年版，“序一”，第1页。

⑨ 陈其可：《中国近世史》上册，“例言”，第1页。

却是以自鸦片战争直到今日为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我们之所以不以明末清初为近代史的开头，而将近代史发端于鸦片战争，理由是很简单的：明末清初不过为两个朝代的交替期，不能代表一个历史的大转变期，而鸦片战争却是中国开始为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涛所袭击，引起社会内部变化的一个重大关键。”<sup>①</sup> 1936年，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自序中解释为何将书名定为“中国近代史”，认为在近百年内“中国国际关系根本改变，思想、学术、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莫不受外影响，其事迹迥异于前古”。<sup>②</sup> 有学者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中国史学界和知识界开始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近代”。不仅有学者在文章中全然使用“近代”一词，更有众多学者在同一意义层面上将“近世”与“近代”通用。到了20世纪40年代，虽然学者们在进行历史分期时还常常使用“近世”，但是以中国近代为断代史内容的著作大多以“近代史”为名，较少人以“近世史”为名了。<sup>③</sup> 经过这样的重构，“近代”时段以鸦片战争为起点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而“现代”作为最近历史的时段划分也与“近代”有了区分。在这种情况下，“近世”作为“最近历史之分期”的价值已难以凸显，其被“近代”和“现代”的历史概念及分期方式所取代也就不可避免了。

#### 四、余论

有学者在述论历史时间与历史书写的关系时指出：“继新的时间概念之后产生了对待历史事实的新态度。时间的新概念问世后，历史学才可能经受规训而脱胎换骨成为一门科学学科。”<sup>④</sup> 这一论断对理解近代中国“新史学”的形成也极有借鉴价值。如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中都申论纪年方式对新史学的重大意义，清末民初时人书写中国历史时借重西方“三段式”或“四段式”的历史时间框架以“区分时代”，这些历史时间对历史学自身的革新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书写者构建了进化的线性时间序列，并在此基础上探求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从而确立了分析史学的范式。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世”“近代”的历史分期，促进了近人重构中国历史时间架构以摆脱“王朝史”制约。

西方现代历史时间体系的移植，使中国历史书写者日益置身于以西方为标准的时间体系中，在全球共时性想象之下将中国历史纳入到“普遍历史”中，这种历史时间体系所具有的价值评判也成为书写者重构中国历史时间的依据。<sup>⑤</sup> 特别是当“共时态比较的结果被依照历时态进行排列，形成了整体历史发展水平上的发展的阶梯，这种阶梯依据把某些民族的现在筹划为另一些民族的将来而定义为‘进步’”，<sup>⑥</sup> “共时”意识下的历史分期造成的结果，便是历史书写趋向西方的“同质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近世”的历史分期以中西交通为依据，实际意指则是只有受到了西方“现代性”影响的历史才足以进入这一阶段，才值得被书写。这种同质化以消解中国历史本身的特点为前提，尽管这为中国融入全球时间秩序、为新史学的构建提供了“条件”，但按照西方历史时间框架书写中国历

① 李鼎声：《中国近代史》，光明书局1930年版，第2页。

②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自序”，第2页。

③ 方秋梅：《“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57~58页。

④ [美] 乔伊斯·阿普尔比、[美] 林恩·亨特、[美] 玛格丽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⑤ 福柯认为，18世纪的两大发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或许是与新的权力技术相关联的，更具体地说是与一种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联的，由此所揭示的社会时间不仅是线性的，而且是“进化的”，进而与“进化的”历史书写紧密相连。参见[法]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80~181页。

⑥ [英] 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4~35页。

史也引发了削足适履的困境。

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学人对移植西方历史分期带来的书写困境的反思，也是逐渐凸显中国历史主体的过程。“近世”历史分期的引入，反映的是时人对融入世界秩序的预期，但这种期待仍需以中国历史实际为依据。直至20世纪30年代，有人在谈及历史教学改革时，仍强调“近世史”要注意“近世文明之泉源与世界之整个发现”。<sup>①</sup>当然，时人更希望有一种交融的历史，即“不是将世界事实，牵附到中国，乃是将世界眼光，观察国史；也并不是把世界历史，范围中史，乃是把中国历史，加入世界历史”。<sup>②</sup>从中国学人对“近世”历史分期的反思与重构中也会发现，构建适合中国历史特点的历史分期，尽管仍然难以完全摆脱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却是在历史书写中凸显中国历史主体性的尝试。

(责任编辑：王华)

## The Historic Writing of *Jinshi* Under the Synchronic Consciousnes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Zhu Wenzhe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early world” (*Jinshi*) concept, which was transplanted from the Western historical staging method, and its historical staging have been endowed with a historical connotation of Chinese-Western communication and competition concerning civilization and nationality. They also conta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recent historical stages and their prediction about futur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owever, in the writing of China’s *Jinshi* generated under the global synchronic consciousness, the time frame and connotation of *Jinshi* periodization form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ecame a limitation o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recent historical stag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making it necessary to rebuild this historical staging method. The transformation of *Jinshi* historical stages also shows the impact of the innovation of global time o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recent historical stages”.

**Keywords:**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cal staging; *Jinshi*; modern times

① 张圣瑜：《革新中学历史教学方案》，《国学论衡》1933年第2期，第3页。

② 陆惟昭：《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史地学报》第1卷第3期，1922年5月，第24页。